
话语动员何以可能？

——基于 1949-2003 年《人民日报》数字缩略语的研究

● Kaiping Zha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kaipingz@mail.tsinghua.edu.cn

● Yuxuan Su

Rixin Colleg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su-yx21@mails.tsinghua.edu.cn

2024 年 3 月 7 日

摘要

建构话语体系是政治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话语塑造着公众认知，影响着政治行动，话语与权力的互动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话语何以动员？数字缩略语提供了一种代表性解释。形如“五讲四美”的数字缩略语是独特的汉语现象，并广泛存在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本。本文发现，数字缩略语的构词特征发韧于传统文化的简洁风格，脱胎于党言党语的斗争格调，形成了“信息打包降低认知负荷”、“韵律铿锵强化情感共鸣”的动员机制。依托批判话语分析理论框架，本文建立了基于《人民日报》文本的 1414 条数字缩略语的数据集。从修辞风格来看，“数词-语素”型、字符长度为四字格、尾字声调为去声的数字缩略语频数居多。从动员效果来看，本文也验证了数字缩略语频数与政治动员的时序相关性。通过爱国卫生运动中的案例研究，本文进一步提炼出政治动员中的“话语锦标赛”，其一是中央激励地方，“核心话语”搭配“延伸话语”撬动体制动员。其二是地方对标中央，“话语加码”辅以“话语形变”助推社会动员。本研究拓展了话语分析与政治动员的定量研究取径，为优化党的执政话语的体系提供了政策借鉴，对通过“核心术语”建设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也有一定的理论启发。

关键词 数字缩略，政治话语，人民日报，宣传动员，计算政治学

1 引言

政治话语建构着观念，生产着权力，塑造着认同，贯穿政治信息获取、政治意识建构、政治知识分享、政治意见表达等多个社会政治生活核心环节，深刻影响着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胡悦，朱萌 2022）。随着政治话语研究中的学科交叉与方法迭代，话语体系、话语修辞、话语动员等子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为我们理解政治话语武器的塑造力与影响力注入了新动能，提炼扎根中国传统的特色话语概念成为新时代政治话语研究的题中之义，数字缩略语就是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概念与表达。

形如“四不两直”、“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数字缩略式政治话语蕴含着独具特色的汉语表达构式，广泛应用于党的文献编纂、宣传动员等领域，成为解析政治修辞、探讨话语权力的重要视点。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出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脍炙人口的数字缩略语。建国初期，革命斗争塑造的军事化话语风格具有强大的惯性，指导着数字缩略语的生产与传播，“除四害”、“三反五反”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改革开放以来，“四个现代化”、“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新生的数字缩略语和弦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强音，彰显着昂扬的政治气候与时代风貌。新时代以来，“八项规定”、“两学一做”、“三严三实”等一系列数字缩略语，展现了反腐、党建、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新规章、新气象。总的来说，“数字缩略式”政治话语蕴含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话语与权力的互构关系可以从数字缩略语和政治动员两种视角进行理解。“以语塑心，以言化人”，不同时期的数字缩略语各有千秋又一脉相承，影响着政治信号的转译，塑造着公众认知的偏好，从而构成政治传播与话语研究的新议题。从学科范式来看，“语言学转向”的学术思潮呼唤着概念提炼的本土化、理论拟定的精准化、方法迭代的科学化（郭台辉 2019）。与此同时，党领导的政治实践对话语的知识生产提出更高要求，话语作为理解现代政党动员功能的切口，往往发挥着目标引领、情感渲染、认同塑造等功能，成为政治动员的基础性构成要素。话语如何动员，动员如何运转？数字缩略语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绝佳切口。遗憾的是，政治学学界尚未对数字缩略语进行系统的考察。

数字缩略语为深入理解“话语即权力”的命题提供了一个视窗。本文围绕“话语动员何以可能”的核心问题，聚焦于话语动员的作用机制与实现方式。从修辞风格来看，数字缩略语的文本内容从何获取，如何获取，又具备哪些修辞风格与统计学特征？从认知机制来看，数字缩略语何以从理性和情感上触动人心，从而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从动员效果来看，数字缩略语的应用与政治动员的开展是否具有时序相关性，央地之间话语互动折射出何种府际权力结构？这都是笔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将从话语动员的角度切入数字缩略语的研究，渐次展开三个层面的分析：一是数字缩略语具备何种修辞风格；二是修辞风格影响政治动员的理论机制；三是动员机制何以影响政治运动的开展。

2 文献回顾

对数字缩略式政治话语的研究横跨政治传播学、历史文献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等多学科领域，因此，笔者将从以下三部分进行文献综述。第一部分从回溯了历史长河中的数字缩略语，并考察了语言学领域的既有研究。第二部分从党史文献出发，综述了“党言党语”的建构路径与风格特征。第三部分综述了政治话语对政治动员的影响。

2.1 数字缩略语的研究视域：从语言学到计算政治学

“数字缩略”是汉语世界古已有之的话语现象。古语中的“三有宅”，即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对应着立法、监察、行政三项国家职能，这是笔者能追溯到最早的数字缩略式政治话语（孔颖达等 1998）。“三国两晋”、“三公九卿”、等数字缩略语，作为民间口口相传的惯习用语，已成为现代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的话语基因繁衍至今，无论是哲学话语中“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数字意象，还是成语构成的四字格律，都以强大文化惯性深刻影响着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塑造着当今汉语习用者的思维方式。

语言学领域对数字缩略现象有所关注。清晰界定的概念是话语分析的前提，殷志平对“数字缩略语”的定义较为权威，他从数字缩略语的构成方式入手，认为数字缩略语是数字概括一串并列的语词（包括词、短语、句子等）的项数，再将共同语素提取出来，组成‘数词 + 共同语素’格式，被概括的一串语词的各项往往结构相同相似，意义相关相近，本文对数字缩略语的定义借鉴于此（殷志平 2002）。在语言学谱系中，数字缩略被归入缩略语的下位概念，从而延展出一系列以缩略辞格为背景的讨论。

然而，数字缩略语并非语言学领域的独享议题，政治学者对此投入关注过少，难免遗憾。之所以将数字缩略语置于计算政治学的学科背景下进行讨论，主要是基于话语属性和语料收集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近年来，数字缩略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国家重要会议文件等政治文本中使用频率非常高，涵盖内容包括国家方针政策、战略目标、民生保障、会议名称等等，具有鲜明的政治话语属性。因此，在数字缩略语的研究中引入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可以为剖析话语与权力的互构作用提供基于学科集群的新视角。另一方面，根植于语言学范式的数字缩略语研究往往遵循着个案分析的范式，着重于厘定数字缩略语的分类标准；少数研究构建了基于辞典、单篇政治文本的初步的语料库，但这些语料库往往源自研究者的主观遴选与手动收集，抽样偏差较大，信息化约严重，难以得出具有统计意义的信服结论。然而从计算政治学的视角看，数字缩略语具有类型多样、多元异构的特征，能够通过自动文本分析（automated text methods）、基于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的上下文学习（in-context learning）等方式进行文本获取、类型识别与规律解析，这种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应用，具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思路与技术基础。因此，将计算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引入数字缩略语的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和方法上的可行性。

总之，风格斐然、应用广泛的数字缩略语是一座亟待开掘的“学术富矿”。数字缩略语如何赓续四字格律的传统，传承表述简洁的风格，体现平起仄落的传统？在考察语言风格的基础上，还需要基于计算政治学范式的进一步分析。

2.2 标语口号中的“党言党语”：领袖风格与军事气质

毫无疑问，口号标语反映着特定的政治（荆学民 2015），标语口号作为一种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话语形式，在党的政治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政治标语作为一种固定权威的表述，具有创新宣传方法、表明政策方向、促进党的团结的作用（Karmazin 2020），也有学者认为标语作为一种语言装置，是强迫性权力的来源，具有辅助国家意识形态目标实现的功能（Song and Gee 2020）。在党的政治实践中，“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等政治标语随着红军的足迹遍布全国，用朴素简洁的语言宣传着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任务，让群众看见、听清、理解和认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张

名片。由此来看，标语口号是政党政治的产物，它作为一种符号，能够将党的政策、政治理念、政治追求明确地表达出来，提高群众对政党的认同感。

“党言党语”彰显着领袖风格与军事气质的融合。学者们认为，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的个人话语与军事斗争的话语塑造了党的政治话语风格，具体来说，这种风格可以总结为：简洁通俗、斩截有力、格调昂扬、贴近群众。毛泽东以浅显易懂、嬉笑怒骂的用语特点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风格。语言学家邢福义曾指出：“就现代汉语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书面语言，无疑是毛泽东著作的语言（[邢福义 1993](#)）。”毛泽东作为一种话语权威对于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一穷二白”、“东风压倒西风”等毛泽东首创的语言大多取材于革命年代的军事斗争，在口口相传中获得了广泛的普及与重构，体现出巨大的创造力与感染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军事斗争与工农革命伴生伴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话语风格。首先，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的军事化与军营中的政治宣传，两者水乳交融，互为一体。早在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党报党刊的命名就展现出了鲜明的战斗性色彩，如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机关刊就叫《斗争》，湘鄂赣省苏维埃机关报叫《战斗报》等，党的报刊命名中贯穿着军事斗争的逻辑，表达着战斗与革命的价值取向（[潘祥辉，王学敏 2023](#)）。由此来看，中国共产党素来重视军队政治宣传工作，军事斗争话语也塑造着和平时期的宣传话语风格。如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致开幕词主题就为《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1994](#)）。用“战线”、“斗争”来形容宣传工作，这种比喻生动反映了话语的斗争性与宣传的军事化。

中国共产党的话语风格脱胎于革命年代的军事斗争，受到卡利斯玛领袖风格的影响。简洁通俗、斩截有力、格调昂扬、贴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话语风格。那么数字缩略语怎样体现出这种风格，这些风格对政治动员有何助益？这都是本文试图分析之处。

3 雄辩与事实：作为动员工具的政治话语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共进行成功的社会动员的历史（[张芝龙 2013](#)）。”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理清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话语是必不可少的钥匙。从类型学来看，政治话语是“政治领导人在政治环境中为完成特定政治目标行使某种政治行为相关的话语，在表现形式上包括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议会辩论、党派纲领、政客演讲等（[Van Dijk 2013](#)）。”毫无疑问，话语表达和反映着特定的政治（[荆学民 2015](#)），学者们聚焦政治话语的修辞渲染效应与认同建构效应，建构了话语动员的理论版图。

从话语文本的流动来看，认同建构效应是团结各方民心，凝聚共同目标，建构政治认同的重要语言功能。政治话语通过构建国家认同以动员广阔疆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古代中国的“书同文”和“语同音”塑造了强大的话语共同体，勾连起各地的政治文化精英，整合起各地多样趋异的资源，塑造了政治精英（主要为士大夫）的广阔的国家想象与天下胸怀（[苏力 2013](#)）。“动员（Mobilization）”原为形容集合战争力量，进入战争状态的军事概念，后逐渐向政治社会领域扩散。亨廷顿认为，政治动员是政党主导下的一种“政治参与”，并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群众基础，从而获得更多认同和支持的过程（[Huntington 2006](#)）。认同建构是政治动员的学术讨论中的重要一环，有学者从议题构建和公众聚合力两个方面来理解政治动员（[孔繁斌 2006](#)），王怀乐从文件政治的视角考察政治动员，认为文件话语的

落实作为“认同聚合”的过程，促进了政治动员功能的实现（王怀乐 2021），由此，“认同聚合”成为讨论政治动员的重要向度。切入认同动员的另一个向度是身份数语，有学者通过分析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发现作为身份数语的“人民”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中普遍使用的政治话语，概括了组织动员的目标与对象，凝聚起更广阔磅礴的政治能量（殷冬水，范京京 2021）。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动员的基础是认同，动员的对象是持有共同信念的人群，认同建构效应是连缀话语和动员的重要枢纽。

从话语本身的内容来看，修辞渲染效应是陈述政治情状，疏通民情民意，建构政治形象的重要语言策略（罗峰 2013）。政治修辞通过引入特定的叙事脚本，操纵符号的呈现方式，诱导人群释放出巨大的精神能量。美国历任总统都深谙修辞政治之道，美国对日宣战前夕，罗斯福以“浇花水管”隐喻《租借法案》的必要性，将晦涩的政见呈现以形象的比喻，唤起了更多民众对法案的支持（王玮 2006）。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巧妙地运用修辞符号，将夸张手法、短句并列、形容词结构的政治修辞运用到极致，以“贴标签”、“打比方”、“讲故事”的政治修辞不断挑拨群众的情绪，让“愤怒的政治”、“恐惧的政治”合流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就是运用政治修辞动员选民投票的典型案例（曹德军 2022）。丰富的政治修辞得到了学界的关注，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提出了“文化置位”（culture positioning）的概念，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过程的核心就是“文化置位”，即运用一系列符号资源的政治说服价值，而修辞就是其中典型的符号资源（Perry 2012）。也有学者从政治话语类型学切入话语动员：比利时学者蓝露洁（Lutgard Lams）从“四个全面”等领导口号的政治话语入手，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精英塑造议程、政策、话语环境的路径（Lutgard 2018），周呈思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省口号”通过大量表态鼓动类的动词实现了话语的动员功能（周呈思 2023）。总的来说，修辞动员是话语动员的重要环节，巧妙运用修辞手法，恰当选择修辞风格，可以通过提高政治表达的温度来增强政治动员的效能。

既有研究肯定了政治话语与宣传动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分析了话语促进动员的具体效应。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鲜有研究从更长时间维度上考察我国政治话语修辞风格的演变趋势。例如在针对领导人文选的分析中，几乎没有比较不同阶段宣传口号的话语风格和具体动员效果。其次，“数字缩略语”作为许多政治口号与政治标语的常见表现形式，却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尚无研究聚焦数字缩略话语结构的特殊性。最后，话语动员的机制受到学者的重点关注，大多数学者要么采取定量方法，从海量话语文本中提炼机制，要么专精个案分析，以质性方法总结动员机制，这两种方法皆有局限性。

概言之，言近旨远的政治文本往往具有丰富多层的含义，案例研究与大数据分析的研究策略如何更好地结合？如何刻画数字缩略语的动员机制？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4 话语动员的机制：认知与情感

随着“以个体为主体”政治传播的崛起，作为话语传播微观基础的受众个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对话语动员的讨论应当下沉到政治话语的个体认知心理（李圆，荆学民 2022）。语言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以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对该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也即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s relativity）是上述讨论的重要基石（Kay and Kempton 1984），该理论认为语言结构深刻影响着人类的

思维方式、政治偏好与行为选择 (Pérez and Tavits 2019)。“话有三说，巧者为妙”，政治语言学研究显示，尽管不同的语言符号表达着相似的含义，然而符号组合方式的趋异却会导致受众理解水平与认同程度的分野 (Kalmar et al. 1987)，这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推导出的重要结论，也是本文进一步讨论数字缩略语动员机制的理论基础 (Newell and Simon 1961)。

4.1 认知机制：信息打包降低认知负荷

信息打包 (information packaging) 是数据通信领域的专业术语，指的是以附加额外信息为代价换取数据传输可靠性的信息传递策略 (Vallduví 1993)。伴随着语言信息学的发展，学者们逐渐关注政治话语的信息结构及其影响，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陆俭明 2017)。既有研究肯定了话语模式¹对话语内容接受程度、话语内容传播效度的影响 (梁凯音，刘立华 2020)。基于英文语境案例分析进一步发现从句“外壳名词打包”现象能够“表达更复杂的经验和更高度的认知” (董敏 2017; 胡壮麟等 2000)。那么数字缩略语是否遵循信息打包的策略，这种话语策略又发挥出什么样的认知效果？

无论信息打包还是话语封装，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不同的符号结构化策略来影响人们的认知效果。澳大利亚认知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 (John Sweller) 针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模式提出了“认知负荷理论”，其中生成性认知负荷指的是通过促进图式构建和图式自动化而引起学习发生的积极负荷 (Sweller 2020)。这启示我们，结构化的语言作为一种图式，快速而自动化地对信息进行归类和封装，将分散的、无关的、含糊的短时记忆，转化为聚合的、关联的、确切的长时记忆。通过“数字缩略”的打包机制，不仅减少了额外认知资源的消耗，而且压缩了政治信息的存储空间，有效降低了个体的认知载荷。从这一点来看，可以将“数字缩略”形象地比作计算机的“文件压缩”，根据信息的分布特征，引入合理的数据结构以凝练地表达同样体量的信息。

类型学告诉我们，人的意识会自动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事物归为一类，并形成对此类事物的整体认识 (金立鑫 2006)。按照类别对事物进行认知是组合思考与深度学习的基础，“数字缩略”恰恰蕴含着一套分类标准，将意义相近、格式相似、长短相同的政治话语进行“打包”，从而将无序、散乱、点状的话语，转化为有序、规整、块状的意义。更深一层来说，数字缩略为话语系统的整理提供了一套归类标准，能够降低话语系统的混乱程度，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

如图1所示，数字缩略作为一种政治信息打包的机制，对冗长的话语片段进行提炼、打包，不仅通过表达简约化实现了信息密度的提高，而且通过构建生成式的认知图式降低了个体的认知负荷。由此，数字缩略的语体特征发挥出类似“口号套语”的作用，成为执政党面向整个社会进行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之一 (付伊 2010)。

4.2 情感机制：韵律铿锵强化情感动员

在政治话语的研究中，情感从未缺席。从亚里士多德的“情感-理性”方法论，到休谟为代表的情感主义哲学，再到马克思对于情感社会属性的深刻阐述，情感政治从来都是诱发集体行动的关键枢纽、理解政治动员的重要视窗 (李圆，荆学民 2022)。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言，“群体的轻信、极端、情绪化反应等弱点，为领袖动员自己的信众提供了可乘之机” (勒庞 2015)，政治动员往往不仅来自经济理性的利益算计，也来自于同情、义愤、尊严感等情感因素驱动。运用政治话语调动情感，激发

¹ 此处的话语模式可以等价理解为信息打包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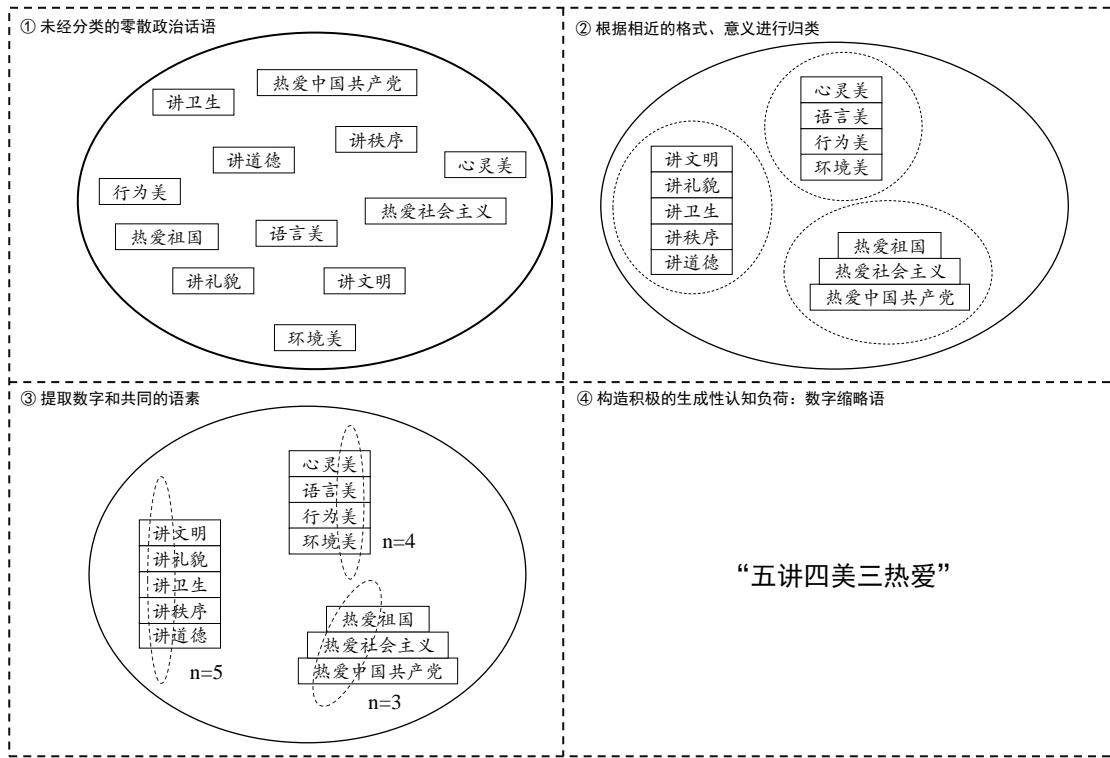


图 1: 数字缩略语的信息打包机制

热情，可以鼓舞人们基于“感动”而行动，投身于政治实践中（李志毓 2018）。由此，情感共振、情感动员、情感治理等议题塑造着政治传播的微观基础，也昭示着动员话语研究的新方向。那么数字缩略语的韵律能否诱发情感共鸣，进而强化政治动员？本节将提供一个基于“节奏-声调”的话语情感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以四字格为主的节奏、以去声收尾为主的声调蕴含着政治认同的心理暗示，能够强化数字缩略语的情感动员效果，下一章的数据分析也支持了本节的结论。

节奏是语言韵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节奏”，是指“语言中那些突显单位之间可感觉到的整齐和匀称”。由于汉语具有较强的双音化趋势，双音节就成了汉语的强势节奏单位。进一步来说，受到双音节模式的推动，四字格律的韵律节奏模式趋向于“2+2”，即成语化的趋势（陈勇，余梓瀚 2023）。由此来看，汉语的“四字格律”呈现出整齐均衡的特征，能够产生起伏顿挫、跌宕回环的情感色彩。这种语言中的“四字格节奏”音律匀称和谐，能够与读者产生紧密的心理链接，读者也能够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下文的统计分析表明，数字缩略语以二字格和四字格居绝大多数，语言表述流畅生动，情感抒发真挚浓烈。

声调作为一种副语言信息（paralinguistic information），是汉语韵律的重要特征，也是情感表达必不可少的桥梁（Fujisaki 1997）。在传统音韵学上，去声，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四声，往往被视为铿锵有力的声调。《元和韵谱》有云：“平声者哀以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黄天骥 2022）林茂灿从声学特征入手，运用物理实验的方式，发现去声的音高下降而发音时间最短（林茂

灿 2012)。这些研究为数字缩略语的声调学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综上所述，去声铿锵斩截，语势雄浑，具有肯定、确信的意味。而“数字缩略语”多为肯定性表达，即引导人们遵从“数字缩略语”的指南行动，或认同话语蕴含的理念（如“四个意识”就是引导人们培养政治、大局、核心、看齐意识）。

总的来说，数字缩略语的节奏更整齐匀称，声调更斩截铿锵，相比于成语或唱词等其他话语风格，数字缩略语更能够从情感上触动人心，达到政治理性与情感需求的统一，从而实现微观层面的情绪渲染与政治动员。总的来看，数字缩略语的动员机制有两种。从认知来看，数字缩略通过信息打包降低认知负荷，让宣传受众更容易接受新话语、新概念、新政策；从情绪来看，数字缩略通过铿锵的韵律唤起并强化情绪共鸣，鼓舞人们基于“感动”而行动。

5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5.1 数据来源

随着计算机获取数据能力的提升、算法的逐步优化、算力的日益增强，批判话语分析在计算政治时代向纵深拓展，自动文本分析、机器学习等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为政治话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极大拓展了学者们对政治话语的认知深度（李锋，王浦劬 2023）。计算政治学的方法允许研究者从历史文本中榨取更丰富的信息，识别更精准的规律，这一点在数字缩略语的研究中有着深刻体现。

本章希望通过分析数字缩略语的话语风格，揭示它的哪些修辞属性契合了政治动员的需求，从而推动政治动员的深化。政治话语的风格分析主要考虑话语的文本特征。1949-2003 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探索与实践，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交织融合，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动员相辅相成，数字缩略语的言说与政治动员的下沉同频共振，因此笔者选择 1949-2003 年作为展开分析的时间维度。经典文本的诠释活动不仅是对文本内容的研究深化与科学解读，而且担负着“道”之引领的社会功能（陈红娟，姚新宇 2021），因此，本文将从话语风格的视角来考察 1949-2003 年《人民日报》文本中数字缩略语的缩略类型、尾字声调、字符长度、出现频次四项特征。

本文选择《人民日报》作为语料库，主要基于宣传受众、传播层级、话语规范性三重考虑。首先，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具有广泛的受众分布，其话语文本可以迅速扩展到全国，这就是其拥有了大众传播的特征（Severin et al. 1997）。其次，《人民日报》居于话语传播的最高层级，许多脍炙人口的政治话语的“源头”就在《人民日报》。最后，《人民日报》的话语文本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其严格的审查制度保证了对党的意志完整准确的贯彻（Wu 1994）。

5.2 变量获取与测量

以话语为单元的文本分析需要提取出符合要求的字段，进而获取数字缩略语文本内容、出现频次等参数。本文利用 Python 对 1949-2003 年《人民日报》的文本内容进行了爬取，并从文本中提取出符合定义的文本。为避免数据遗失，笔者通过程序设置了提取数字缩略语的必要不充分条件：(1) 单、双引号中的文本内容；(2) 引号中只有汉字数字且第一个字符就是汉字数字；(3) 引号中并非只有数字或两个数字紧邻（排除形如“五一劳动节”的字段）。提取出以上字段后，笔者又进行了手动数据清洗，最终筛选出了 1414 条符合定义的“数字缩略式”政治话语。接下来，笔者从语言学的维度统计了“数字缩略语”的诸多特征，如表1、表2 所述。

表 1: 本文涉及的概念及其含义

| 概念名称 | 含义 | 举例 |
|------|----------------------|--------------------------|
| 尾字声调 | 末尾字符的声调 ¹ | 如两个维护的“护”为去声，即声调为 4 |
| 字符长度 | 数字缩略语的字数 | “三废”为 2，“五讲四美三热爱”为 7 |
| 动员强度 | 一年中政治运动的次数 | 1952 年发生 9 场政治运动，动员强度为 9 |

¹ 音韵学对汉语的声调有更充分的讨论，本研究仅从一般意义上按照“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方法进行分类。

表 2: 本文涉及变量的数学特征

| 概念名称 | 平均值 | 众数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尾字声调 | 2.82 | 4.00 | 1.00 | 4.00 |
| 缩略项数 | 4.34 | 3.00 | 2.00 | 60.00 ¹ |
| 字符长度 | 3.44 | 4.00 | 2.00 | 8.00 |
| 出现频次 | 102.17 | 6.00 | 6.00 | 28811.00 |

¹ 特别的，“60.00”对应的数字缩略语是“六十条”，即 1961 年 3 月中共中央讨论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

为衡量政治动员的强度，笔者根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一书统计了 1949-2003 年所有的政治运动（包括整党运动、党内集中学习、思想教育运动、专项整治行动等）的名称及起止年份。通过整理，笔者发现 1949-2003 年间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几乎每一年都发生过不止一次政治运动。因此，笔者将以一年中政治运动的次数来测量政治动员的强度。1949-2003 年政治运动次数的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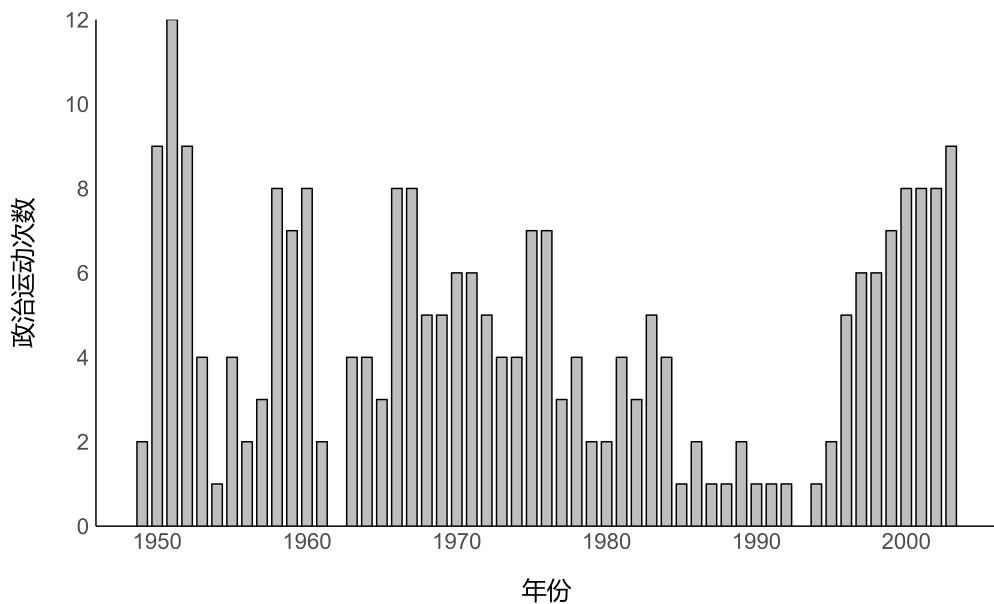


图 2: 1949-2003 年政治运动次数的变化趋势

6 话语怎样动员：数字缩略语的修辞风格

话语能否动员，话语以何动员，这两个连续的命题构成了考察话语动员的基本逻辑基础。首先，本节将从宏观层面检视数字缩略语与政治动员的关系，观察两者的变化趋势，回答“话语能否动员”的问题。接下来，本节将通过类型学分析，将数字缩略语的特殊修辞属性与话语动员的普遍机制进行缀连，从而回答“话语以何动员”的问题。

6.1 话语能否动员：时序相关分析

合理地评价话语动员的效果，不仅能够检验动员机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为进一步分析政治动员中的央地话语互动奠定了基础。从时间尺度上看，数字缩略语与政治动员是否同频共振？笔者进行了1949-2003年的时间序列分析。如上文所述，动员效果的测量标准是单位年份中政治运动的次数，图3中的实线刻画了动员效果的年份波动趋势；数字缩略语的测量标准是单位年份《人民日报》中出现的数字缩略语的总频次，图3中的虚线刻画了数字缩略语频次的年份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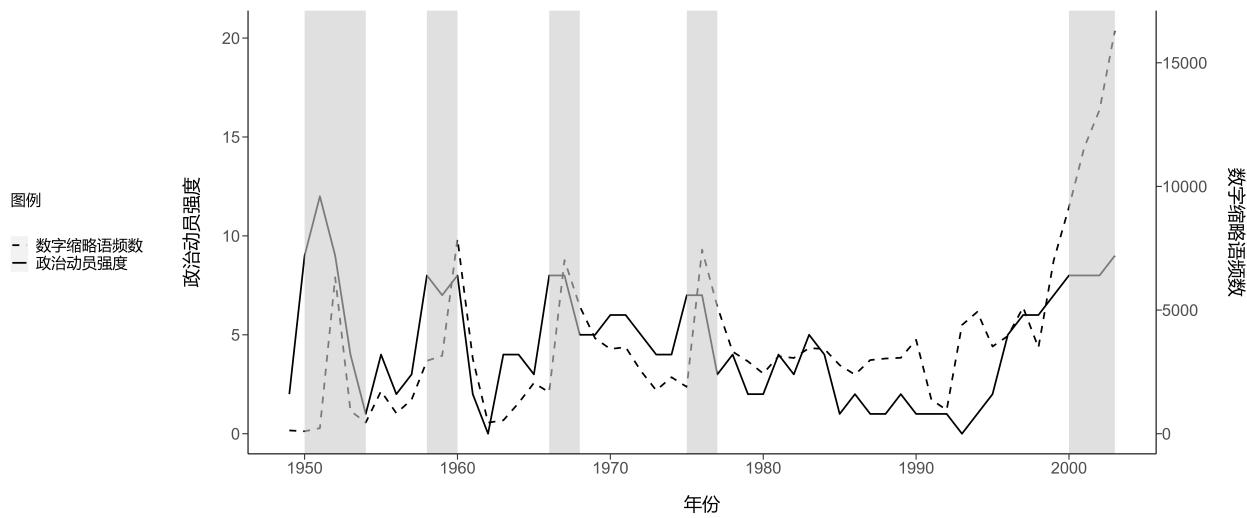


图 3: 数字缩略语频数与政治动员强度变化趋势对比

两条曲线均在1952年、1959年、1968年、1976年、2003年前后达到顶峰，也就是图4中的灰色条带区域。这五个年份也分别对应着1949年以来的五次政治动员高潮，分别是以“三反五反”为代表的建国初政治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清查“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图4显示了数字缩略语频数与政治动员强度的变化趋势，并展现出两条趋势之间的强烈共变性，这种共变性在宏观层面检验了话语动员的实际效果：一年中数字缩略语频数越多，往往意味着本年有更强的政治动员。

6.2 话语以何动员：修辞属性分析

6.2.1 分布特征

当数字缩略语被生产出来之后，什么样的数字缩略语会频繁出现在政治表述中，成为政坛“常青树”，融入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什么样的缩略语昙花一现，旋生旋灭，出现后迅速地淹没于庞大的话语海洋而无人问津？笔者以党史为轴线，刻画出高频数字缩略语的基本轮廓，为接下来的修辞属性奠基。笔者筛选了 1949-2003 年出现频次在 1000 次以上的数字缩略语，共 24 条，表3按照时间顺序对其进行排序，并统计了其各项特征。

表 3: 1949-2003 年出现频次 1000 次以上的数字缩略语

| 数字缩略语 | 出现频次 | 首次出现的年份 |
|--------|-------|---------|
| 三个代表 | 28811 | 2000 |
| 三结合 | 8019 | 1954 |
| 三讲 | 6428 | 1957 |
| 一国两制 | 6321 | 1984 |
| 两会 | 2877 | 1952 |
| 三支两军 | 2759 | 1967 |
| 三自一包 | 2649 | 1964 |
| 四化 | 2390 | 1957 |
| 三项指示为纲 | 2118 | 1976 |
| 三反 | 1858 | 1949 |
| 三通 | 1616 | 1949 |
| 三下乡 | 1597 | 1996 |
| 三资 | 1469 | 1986 |
| 三包 | 1464 | 1950 |
| 三乱 | 1438 | 1980 |
| 五反 | 1303 | 1952 |
| 三废 | 1253 | 1965 |
| 四害 | 1236 | 1956 |
| 三定 | 1224 | 1952 |
| 五个一工程 | 1172 | 1991 |
| 四有 | 1119 | 1951 |

由表3可见，政治话语具有鲜明的特色，反映着不同年代的核心政治任务。历史上，每一代领导人都会提出一组新的口号，作为其内政外交政策的标志，这些口号往往简短有力，易懂易记，起到简化政治纲领，勾勒国家总体发展方式的作用，而数字缩略的形式恰恰是上佳的载体。以我国中央政府的对台方针为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对台方针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其政治话语的呈现形式一脉相承，即均采用了“数字缩略”的形式特征。从 1956 年毛泽东提出的“一纲四目”，到 198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的“叶九条”，邓小平提出的“邓六条”，江泽民提

出的“江八点”等等，这种作为口号的数字缩略语，以“姓氏 + 数字缩略语”的形式特征为主，既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台关系的战略规划与发展期待，又深深烙印上了领导人的个人特色。对台方针的数字缩略语以简短有力、信息丰富的表达方式，不仅树立了领导人的鲜明政治形象，而且有力推动了宣传动员的下沉扩散。

6.2.2 缩略类型

本文借鉴语言学学者的观点，将“数字缩略式”政治话语分为“数词 + 量词 + 语素”、“数词 + 语素”、“数词 1+ 语素 1+ 数词 2+ 语素 2”共三种。三种数字缩略语的构成方式与典型例子如表4所示。

由此，本文考察了三种类型数字缩略语的数量，如图4所示。统计发现，在 1414 条数字缩略语中，“数词 + 语素”型总量最多，达到 655 条；“数词 + 量词 + 语素”型与“数词 1+ 语素 1+ 数词 n+ 语素 n”型总量次之，分别为 475 条与 284 条。“数词 + 语素”类型的数字缩略语省去了中间的量词，仅表达单一的意涵，从而消除了缩略嵌套，避免了意多乱文。由此来看，“数词 + 语素”的数字缩略语满足话语经济性以减轻认知负荷，符合“信息打包”机制的要求，这种类型的数字缩略语的数量也更多。

表 4: 数字缩略语的分类标准

| 构成方式 | 典型例子 |
|--------------------------------------|--------------|
| 数词 + 量词 + 语素 | 六大战略、四个现代化 |
| 数词 + 语素 | 三废、四不准 |
| 数词 1+ 语素 1+ 数词 2+ 语素 2... 数词 n+ 语素 n | 三支两军、五讲四美三热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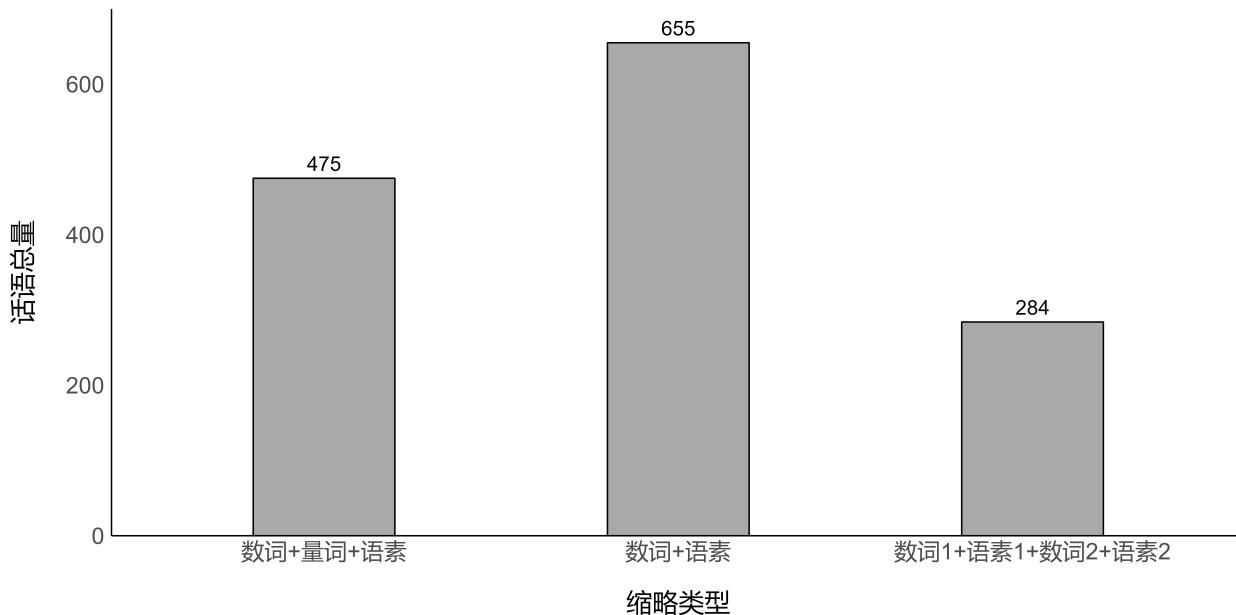


图 4: 不同类型的数字缩略语数量

6.2.3 字符长度

语言学家齐普夫（George Kingsley Zipf）指出，词语长度同它们出现的相对频率成反比，尽管其比例不一定很严格。鉴于词语高频使用所带来的词语的永久性简缩或临时性替代，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随着词语使用相对频率的增加，存在一种推动词语简缩自身长度的倾向（Zipf 2013）。本研究认为，一方面，由于汉语具有较强的双音化趋势，双音节的数字缩略语就成为强势的节奏单位；另一方面，由于四字格律在成语中的广泛应用，数字缩略语中的四字格出现也较多。

统计数据也支持这个结论，由图5可知，在1414条数字缩略语中，字符长度为2、3、4项的数字缩略语总量分别为406、265、584，均在200以上。而字符长度为5、6、7、8的缩略语总量分别为69、59、26、5，均在70项以下。由此来看，字符长度为2项或4项的数字缩略语总量显著较多。

6.2.4 尾字声调

由动员机制部分的理论建构，“数字缩略语”格外需要以去声结尾来增强其说服力与肯定性，去声收尾的数字缩略语则更容易被生产出。统计数据分析支持这个结论。由图6可见，在1414条数字缩略语中尾字声调为一、二、三声的话语总量分别为262、311、261条，而尾字声调为四声（去声）的足有580条，显著高于前三个声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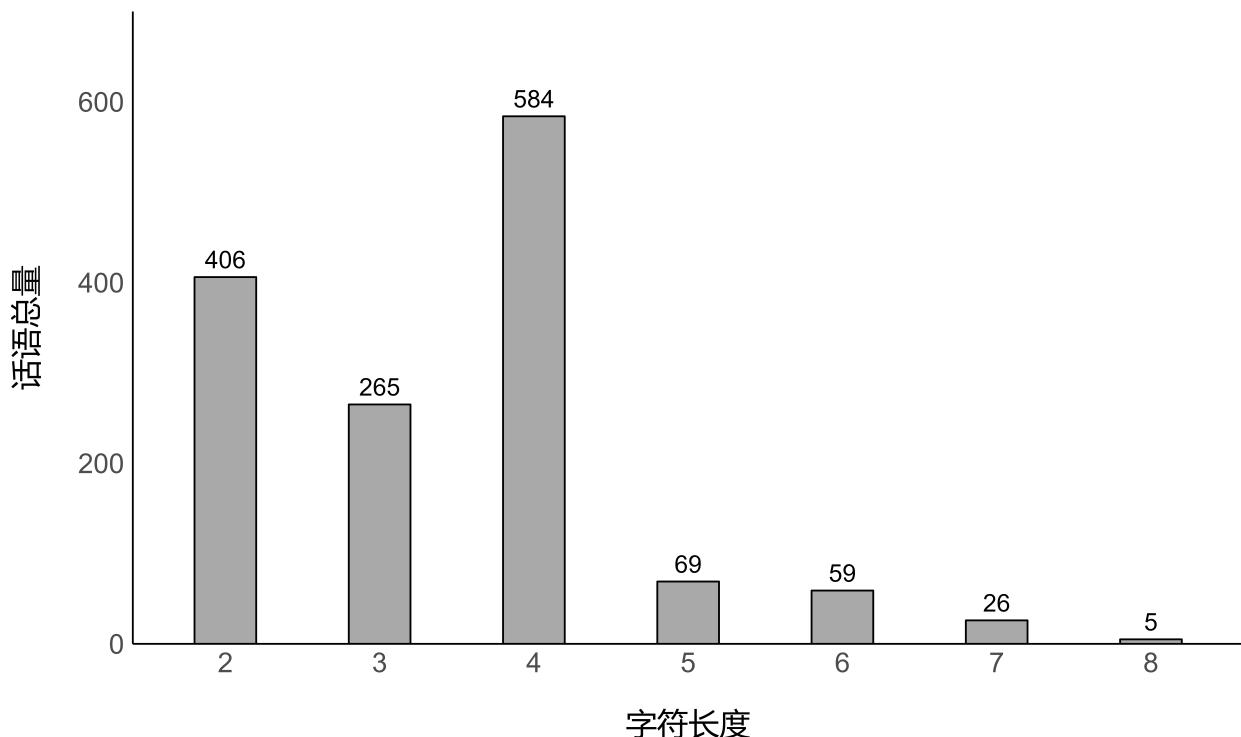


图 5: 不同长度的数字缩略语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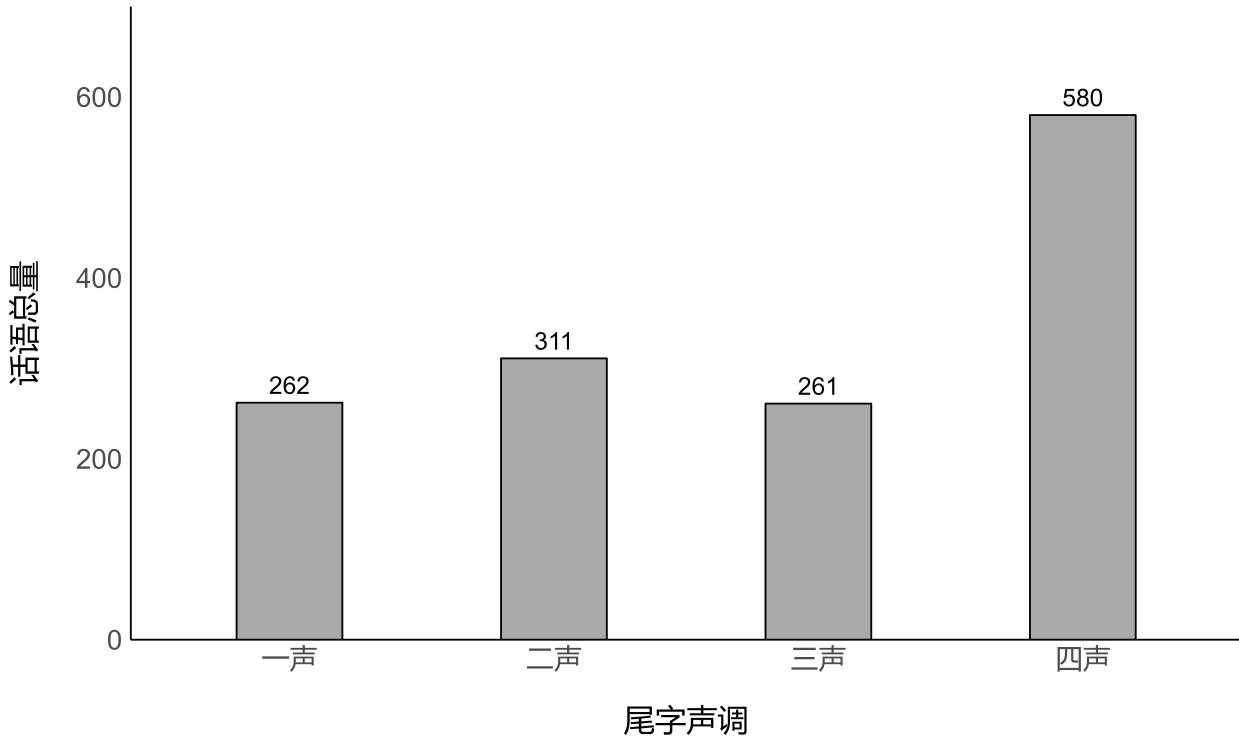


图 6: 不同尾字声调的数字缩略语数量

7 动员如何运转：话语锦标赛

7.1 案例选择：爱国卫生运动

上文从个体层面刻画了数字缩略语的动员机制，也从时间跨度上验证了话语动员的效果。然而话语与权力的互构关系提醒我们，不应当止步于话语如何动员的讨论，而应当进一步关注政治动员的发起者如何巧妙运用数字缩略语这一语言工具，更好地服务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个议题可以拆解为两个子问题，数字缩略语何以跃迁于央地政治语境，实现话语的扩散、繁衍与再造？话语的流动折射出央地之间的何种权力结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深度浸润史料，细描话语流动的路径轨迹，提炼话语动员的一般规律。笔者选取 1952 年“爱国卫生运动”为案例，分析党如何运用数字缩略语为主导的政治口号进行政治动员。

在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于 1952 年肇始的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运动，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卫生观念和国家卫生医疗体系的建设。由于这场群众性的防疫卫生运动是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而发动，是保家卫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而开展，所以它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并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1952 年 3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使用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一词（肖爱树 2003）。由此来看，爱国卫生运动将病理性的“卫生”与政治性的“爱国”相结合，借助国家及其自上而下地动员群众参与其中，是理解现代中国政治动员的重要切口。因此本文对爱国卫生运动进行个案分析。

7.2 数字缩略语的“加码”与“形变”

通过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的检索可以确定某个数字缩略语的首次出现时间与上下文内容。由此，笔者发现了数字缩略语融入政治动员的两个阶段：

7.2.1 中央指导地方，“核心话语”搭配“延伸话语”推动自上而下的体制内动员。

核心话语的来源较为权威，出现频次高，应用场景广泛，如爱国卫生运动中脍炙人口的数字缩略语“除四害”。核心话语往往时至今日仍然时时被人们提及，成为了一代人的时代记忆，具有极为广泛的生命力。延伸话语是核心话语的派生产物，主要用途是阐发、延拓核心话语的含义，让核心话语更加立体丰富。以“四害”这个话语为核心，中央创造出了运动的方针（“三大方针”）、运动的方法（“五不”、“十要”）、运动的目标（“四无机关”）等，这些延伸话语的出现频率没有核心话语那么高，主要是用来辅助核心话语“除四害”来撬动政治动员。如表5所示，中央通过核心话语搭配边缘话语推动自上而下的体制内动员。

表 5：数字缩略语的分类标准

| 数字缩略语 | 类别 | 释义 |
|-------|------|--|
| 四害 | 核心话语 | 苍蝇、蚊子、老鼠、麻雀 |
| 四无 | 核心话语 | 无蝇鼠、无蛆、无孑孓、无麻雀 |
| 三大方针 | 延伸话语 |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
| 五不 | 延伸话语 | 不喝生水，不吃腐败变质和不清洁的食物，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不乱丢果皮纸屑。 |
| 十要 | 延伸话语 | 要常剪指甲、常理发，衣被要常洗、常晒 |
| 四无机关 | 延伸话语 | 无蝇鼠、无蛆、无孑孓、无麻雀的机关单位 |

7.2.2 地方对标中央，“话语加码”搭配“话语形变”推动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

第二阶段中，地方以中央的数字缩略语为母版，繁衍出更多的富有地方特色的缩略话语。原先的数字缩略语会不断“加码”或“形变”，形成新的话语。缩略语的“加码”，指的是将话语指标体系进行数值上的放大，延纳更多的政治语词，反映更丰富的政治内涵，如根据“四害”繁衍出“六害”、“七害”，根据“四无”繁衍出“三洁四无”、“五洁四无”、“八洁四无”等。数字缩略语的“形变”，指的是地方在领会中央指导精神的基础上，创造出形式迥异但意义相似的缩略语，如表6所示。

7.3 层层加码：话语锦标赛

锦标赛的官员晋升机制由周黎安提出，该模型强调官员晋升的同级竞争性与经济绩效导向 (Zhou 2007)。学者们普遍认为，“层层加码”现象的出现与我国“层层分包”的行政体制和多层次的官员政治锦标赛有着内在的关联 (周黎安等 2015)。本文认为，话语是政策扩散与政策学习的载体，现有研究忽视了文本话语中的“锦标赛”。由前文的案例分析不难看出，话语的“对标”反映着政策的“跟风”，话语的“加码”蕴含着一系列的政策学习、政策创新行为，呈现出“中央吹哨，地方追随”的政策互动 (李元珍 2023)。考虑到制度扩散中话语文本与政治实践的深刻互构 (Phillips et al. 2004)，当层层压实、

表 6: 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话语加码与话语形变

| 缩略类型 | 数字缩略语 | 首创地区 | 释义 |
|------|-------|------|---|
| 加码 | 五洁四无 | 山东省 | 具体释义不详 |
| 加码 | 八洁四无 | 辽宁省 | 具体释义不详 |
| 加码 | 四无八净 | 辽宁省 | 具体释义不详 |
| 加码 | 五害 | 上海市 | 蝇、蚊、鼠、臭虫、蟑螂 |
| 加码 | 六害 | 安徽省 | 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臭虫、蟑螂 |
| 加码 | 七害 | 广东省 | 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虱子、臭虫、白蛉 |
| 加码 | 九害 | 四川省 | 鼠、雀、蚊、蝇、虱、蚤、蟑螂、害兽、害鸟 |
| 形变 | 两管五改 | 山西省 | 管水、管粪，改造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 |
| 形变 | 四自一联 | 黑龙江省 | 自修门前路，自栽门前树，自通门前水，自搞门前卫生，受益单位联合起来集资搞小城镇建设 |
| 形变 | 门前三包 | 北京市 | 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 |

逐条对标的政局压力传导到话语文本的表现，就是话语文本向中央“对标对表”，向上级“看齐靠拢”。中央希望遴选典范的地方政策以树立标杆，地方也希望自己的政策话语得到中央的认可，然而不是每一条地方政策都会得到中央的青睐，话语能否成功地“向上流动”，需要经历竞争、比拼和筛选，一些话语将会落败，成功的话语将得到推广，其代表的政策将报道于象征着中央嘉许的《人民日报》。话语在流动中完成政治动员的任务，这个过程就是“话语锦标赛”。

在话语锦标赛中，“加码”与“形变”将助力话语脱颖而出。如黑龙江省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创新性提出“四自一联”的工作方法，即自修门前路，自栽门前树，自通门前水，自搞门前卫生，受益单位联合起来集资搞小城镇建设。这不仅契合了爱国卫生运动一以贯之的精神，又结合了彼时火热开展的小城镇建设风潮，在哈尔滨等地区得到了迅速推广，并获得了《人民日报》的转载。由此，这项先进经验向更多地区推广开来。通过对先进地区和模范个体的共同塑造，有利于激发地方争取先进、群众努力追赶的氛围。由此，地方通过话语的加码与形变推动政治动员的进一步下沉。

如图7所示，一方面，地方通过“话语加码”发扬了中央意志，传递出服从中央的信号，更容易获得中央青睐，从而在锦标赛中获得优胜；另一方面，地方通过“话语形变”将刚性政策与地方性知识有机结合，这些话语往往契合天南海北的地方特色，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独特要求，中央对地方先进经验进行汲取，恰能够有效回应基层诉求，实现更有效、更精准的政治动员。因此，“话语锦标赛”不同于竞逐单一经济增长指标的“晋升锦标赛”，话语锦标赛以更高水平政治动员为导向，以话语加码、话语形变为竞争工具，以话语的纵横向扩散为最终结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一场接一场的话语锦标赛中，在层层话语加码下，中央的动员令被不断重复言说直至深度贯彻，地方的政策回音在锦标赛中脱颖而出，成为进一步动员的典范标杆，这就是话语动员的基本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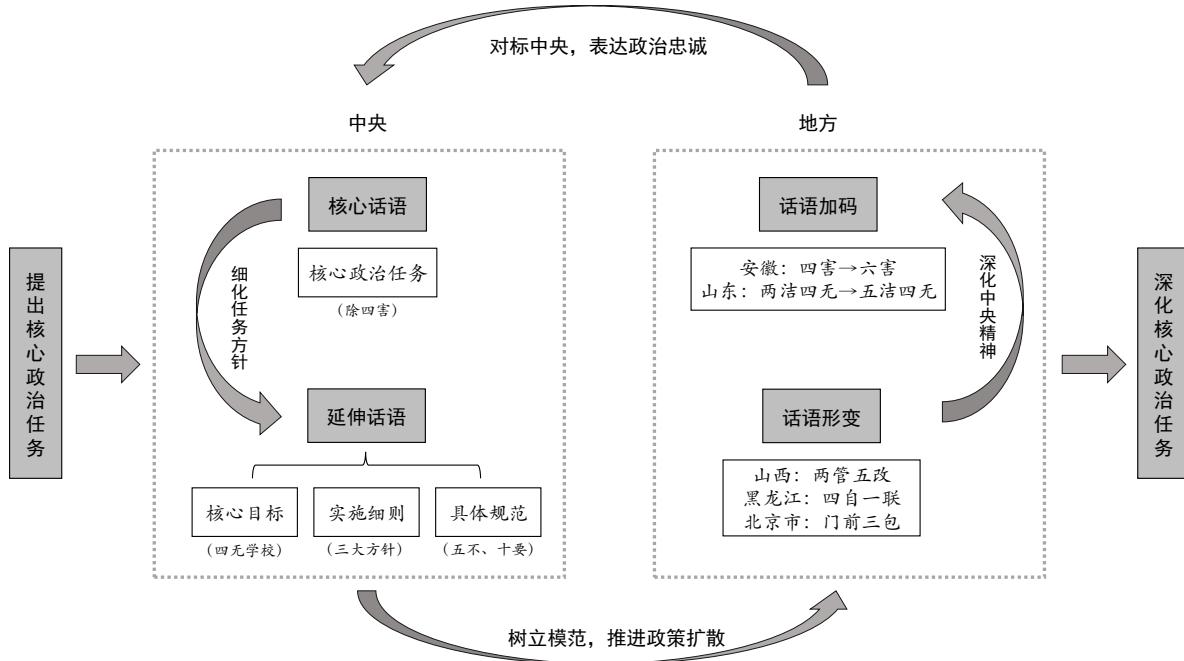


图 7: 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话语锦标赛

8 总结与讨论

围绕《人民日报》中的数字缩略语，笔者建立了包含 1414 条数字缩略语的语料库，并发现“数词-语素”型、字符长度为四字格、尾字声调为去声的数字缩略语频数居多。通过跨学科理论对话，笔者提出了“信息打包降低认知负荷”、“韵律铿锵唤起情感共鸣”的话语动员机制。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的案例研究，笔者归纳出数字缩略语融入政治动员的两阶段，其一是中央指导地方，“核心话语”搭配“延伸话语”推动自上而下的体制内动员。其二是地方对标中央，“话语加码”以及“话语形变”推动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此外，笔者验证了数字缩略语的频数与政治动员之间具有高度时序相关性，加强了个案研究的结论。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能力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复合体现（项敬尧 2021）。数字缩略语作为话语整合同时也是社会统合的符号，深深嵌入政治社会之中，体现着话语权力与政党能力的互构，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适应能力和服务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

本研究贡献在于：(1) 聚焦数字缩略语，并从这一特殊话语形式中管窥政治话语与社会权力的互动策略，“小切口”回应“大问题”，丰富了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中国实践。(2) 在跨学科研究视野的基础上，积极与现有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乃至认知科学相关理论展开对话，归纳出话语动员具体机制，实现了理论机制的边际创新。(3) 通过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式，创建了数字缩略政治话语数据库，展现了数字缩略语的修辞风格与各项基本特征，并借助爱国卫生运动“显微镜”式的案例研究，勾勒出话语动员的历史轮廓，拓展了政治话语研究的理论纵深和方法取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话语问题，将建设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多个场合进行深刻阐发，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践的范围（[杨雪冬 2022](#)）。“鉴古而知今，彰往而知来”，把握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关联性是探析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基本参照（[谭海波，石一琨 2023](#)）。党报党刊中的数字缩略语植根于汉语言文化的历史土壤，具有鲜明的历史风骨与中国气质，是一座亟待开掘的学术富矿。新时代的宣传动员如何更好地运用数字缩略语的独特结构，政治话语如何更好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这都是数字缩略语研究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期待着进一步的研究。

References

- Hiroya Fujisaki. Prosody, models, and spontaneous speech. In *Computing prosody: Computational models for processing spontaneous speech*, pages 27–42. Springer, 1997.
-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Ivan Kalmar, Zhong Yong, and Xiao Hong. Language attitudes in guangzhou, china. *Language in Society*, 16(4):499–508, 1987.
- Aleš Karmazin. Slogans as an organizational fe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5(3):411–429, 2020.
- Paul Kay and Willett Kempton. What is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6(1): 65–79, 1984.
- Lams Lutgard. Examining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chinese official discourse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3(3):387–411, 2018.
- Allen Newell and Herbert A Simon. Computer simulation of human thinking: A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 expressed as a computer program permits simulation of thinking processes. *Science*, 134 (3495):2011–2017, 1961.
- Efrén O Pérez and Margit Tavits. Language influence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equali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1(1):81–93, 2019.
-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volume 24.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 Nelson Phillips, Thomas B Lawrence, and Cynthia Hardy. Discourse and institu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9(4):635–652, 2004.
- Werner Joseph Severin, James W Tankard, et 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 Longman New York, 1997.
- Jianlin Song and James Paul Gee. Sloga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a discourse form. *Discourse & Society*, 31(2):201–217, 2020.
- John Sweller. Cognitive load theory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68(1):1–16, 2020.
- Enric Vallduví. *Information packaging: A survey*. Citeseer, 1993.
- Teun A Van Dijk. *News as discourse*. Routledge, 2013.

- Guoguang Wu. Command communication: The politics of editorial formulation in the people's daily. *The China Quarterly*, 137:194–211, 1994.
- Li-An Zhou. Governing china's local officials: An analysis of promotion tournament model.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7:36–50, 01 2007.
- George Kingsley Zipf. *The psycho-biology of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dynamic philology*. Routledge, 2013.
-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 1951-1992 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URL <https://books.google.co.jp/books?id=D6NTAAAAIAAJ>.
- 付伊. 60 年来《人民日报》时政新闻版中的口号套语的嬗变——中国新闻语言现代性进程的一个视角.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6):46–50, 2010.
- 勒庞.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中央编译局, 2015.
- 周呈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省口号的话语演变. *新闻与传播评论*, 76(3):27–41, 2023.
- 周黎安等. “层层加码”与官员激励. *世界经济文汇*, (1):1–15, 2015.
- 孔繁斌. 政治动员的行动逻辑——一个概念模型及其应用.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5):79–84, 2006.
- 孔颖达等. 尚书注疏. 唐宋注疏十三经 (册一), 1998.
- 张芝龙. 微博动员的泛组织化问题探析. *东南传播*, (12):44–46, 2013.
- 曹德军. 政治修辞的技艺: 战略叙事中的说服、框定与历史记忆. *中国政治学*, pages 14–36+147–148, 2022.
- 李元珍. 对标对表: 一种中国特色的政策话语转译行为. *中国行政管理*, 39(98-105), 2023.
- 李圆, 荆学民. 论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的情感. *南京社会科学*, (111-120), 2022.
- 李志毓. 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动员. Website, 2018. https://www.sohu.com/a/235509699_120776.
- 李锋, 王浦劬. 计算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新文科理论与实践*, (56-67+126-127), 2023.
- 杨雪冬. 政治话语构建: 一个初步分析. *中国政治学*, (3-13+147), 2022.
- 林茂灿. 汉语语调实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梁凯音, 刘立华.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 *社会科学*, (7):136–147, 2020.
- 殷冬水, 范京京. “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
- 殷志平. 数字式缩略语的特点. *汉语学习*, (2):26–30, 2002.
- 潘祥辉, 王学敏. 中国共产党报刊名称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1919—1956)——一项基于党报党刊名称数据库的分析. *未来传播*, 30(2-13+136), 2023.
- 王怀乐. 政治动员视角下的文件政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式的一种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7(2):17–27, 2021.
- 王玮. 富兰克林·罗斯福外交中的开放原则.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pages 27–35, 2006.

- 罗峰. 用好“政治修辞学”唱响“中国好声音”. Website, 2013.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05/c168825-20680513.html>.
- 肖爱树. 1949~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述论. *当代中国史研究*, 10(1):97–102, 2003.
- 胡壮麟等. 评语法隐喻的韩礼德模式. *外语教学与研究*, 32(2):88–94, 2000.
- 胡悦, 朱萌. 以语塑心与国民治理: 外语习得对政治认知能力的塑造机制研究. *治理研究*, 38(4):51, 2022.
- 苏力. 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书同文”和“官话”为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 (12):78–95, 2013.
- 荆学民. 政治传播简明原理.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
- 董敏. 外壳名词及其翻译对等的语法型式分析. *外语教学*, 38(2):86–90, 2017.
- 谭海波, 石一琨. 危机动员与“道统”正当: 古代中国灾荒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宋代淳化至绍兴年间江浙地区瘟疫的史料分析. *政治学研究*, (46-58+150), 2023.
- 邢福义. 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3.
- 郭台辉. 语言的政治化与政治的语言化——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转向”问题. *政治学研究*, (4):66–76, 2019.
- 金立鑫. 语言类型学. 外国语, 5, 2006.
- 陆俭明. 重视语言信息结构研究, 开拓语言研究的新视野. *当代修辞学*, (4):1–17, 2017.
- 陈勇, 余梓瀚. “一 a 再 a”的构式化.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143-149), 2023.
- 陈红娟, 姚新宇.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百年文本诠释与意义生产. *探索与争鸣*, (34-45+229), 2021.
- 项敬尧. 论中国共产党政党能力. *教学与研究*, 55(7):55, 2021.
- 黄天骥. 诗词创作发凡.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